

## 德、法汉学与中国现代学术之互动

### ——以卫礼贤、伯希和与留西学人的交友为中心

叶 隽

就20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学术而言，世界学术中心场域虽完成了由德国到美国的转变，但作为思想原创地的欧陆价值却并未受到削弱，20世纪上半期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发达，20世纪下半期以福柯、布迪厄、德里达为旗帜的法国思想的异军突起<sup>1</sup>，都足以证明此点。实际上，相比较主流学术与思想的蒸蒸日上，作为该国学术与文化场域边缘的东方学（包括汉学），其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边缘-中心”的互动作用，本文不拟采取萨义德过于强调“权力话语”的宰制式眼光<sup>2</sup>，而试图调和与沟通这一学术地图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从汉学与主流学术的互动与思想生成角度，我们会获得理解汉学发展的崭新眼光；而就国际汉学的发展来说，第一流的大家始终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与思想互动。有趣则在于，当20世纪前期之时，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重要时代，就此期来看，有两位汉学家意义相当重要，即德之卫礼贤（Wilhelm, Richard, 1873-1930）、法之伯希和（Pelliot, Paul, 1878-1945）。卫礼贤长伯希和五岁，但对后者却甚是恭敬。之所以如此，那自然还是因为伯希和为国际汉学祭酒的原因。本文尝试分别梳理卫礼贤、伯希和与中国现代代表性学者的交友状况，并进而构建起一个德法汉学共享的中国学术圈，并追问其意义。

#### 一、卫礼贤的中国交游：以蔡元培为中心<sup>3</sup>

1899年，作为德国传教士，卫礼贤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恐怕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在这里度过将近半生的岁月，并且藉此做下对于德国乃至西方文化厥功甚伟的事业。与其前任花之安不一样的是，卫礼贤开辟了一种崭新的事业，就是由传教士汉学走向了学院汉学，这虽然远不能代表德国汉学的发展，但这样一种路径的开辟，确实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史与文化史意义。相比较那些纯粹科班出身的汉学家们，卫礼贤以他的中国经典德译工作和对中国的人类学感觉和体验性认知，为德国汉学的后发崛起提供了一种难得的范式标本，并最终在世界汉学场域里名垂青史。然而，在当时的语境里，卫礼贤以一传教士出身的业余汉学家身份，而欲在学术界博得容身之地，实在不易，可他毕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承认。而卫礼贤在中国的广泛交游与近乎人类学的深刻认知，则为他

<sup>1</sup> 关于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流布与影响，可参见 Cusset, Francois: *French Theory –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ie et les mutations de la vie intellectuelle aux Etats-Unis* (法国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与公司 & 美国知识生活的变化)。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3, 2005.

<sup>2</sup> 在他看来，东方学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她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萨义德（Said, Edward W.）：《东方学》（*Orientalism*）第16页，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sup>3</sup> 此节内容材料主要取自拙著：《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在德国学术与文化场域的成功打下了良好与关键的基础。以青岛被日本占据为转折，卫礼贤在中国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青岛时代（1899-1920年）与北京时代（1922-1924年），虽然后者的两年光阴只有前者20年时间的十分之一，但就卫礼贤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关系网络建构而言，却几乎是同等重要。因为不同地区和场域所提供的，几乎就是完全不同的发展可能。作为殖民地的青岛在其时的中国人眼里，享有特殊的文化地位，所以前清帝国的遗老遗少往往在此聚集，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便是在中国早期共和的年代里，此城仍有“帝国遗韵”；而卫礼贤则充分利用了他作为德国传教士的便利条件，他与这批遗老往来密切甚至频繁，其目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他们的文化身份，要知道中国的传统“学而优则仕”，故此官宦人物中不乏鸿学硕儒之士。卫礼贤利用其在青岛的便利条件，与这些人交往密切，并进而发起组织了一个“尊孔文社”，其目的既在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还致力于进行中西学术交流。卫氏自己后来的这样一段叙述，大致可以见出其初衷：“当时的想法是，着眼未来，力争对其时已受到严重损害的中国文化宝库进行抢救。我们应当通过翻译、报告、学术著作等方式，来加强东西方思想界的联系与合作。例如，可以把康德的著作译成中文，也可以把中国的经典译为德文。”<sup>4</sup> 这些人物包括作为尊孔复古中坚力量的劳乃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康有为、陈焕章，也有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监督）、溥伟（恭亲王）、徐世昌（前军机大臣）、赵尔巽（前东三省总督）、升允（前陕甘总督）、周馥（前两江总督）等。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些遗老们常相接触，卫氏不但在国学学问上大有长进，而且也连带附和了他们的“复辟主张”，甚至主动地出谋划策让清逊帝溥仪与德国皇室联姻，以换取德国支持<sup>5</sup>。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文化意识。至于说到北京，虽然早在青岛时代，卫礼贤就与北京建立了关系，但那毕竟只能是浮光掠影，很难和他亲身任职并长期居留的时代相比拟。

当1922年卫礼贤再返中国时，是以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的身份来的。所以，居留的地方，正是其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这就与原来作为德国殖民地的青岛大不一样，他得天时地利，与中国的新派人物开始交往起来，尤其是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蔡元培、胡适等，并赞扬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极其现代”的精神<sup>6</sup>。他在日后论及心目中的“新中国”时，这样提到蔡元培：“在这一时期，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尤其大。蔡元培属于老派学者，他曾经是翰林院的成员之一。但是，他却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支持新运动，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领导地位。他是老一代领袖人物中唯一在欧洲大学中呆过的人。回国之后，他担任了教育总长，后来又被委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新创造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是他的主要目的。”<sup>7</sup> 虽然以外来者的身份，使卫礼贤很难能真正地深刻体察五四时代对中国在文化意义上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意义，但这种近乎局中人的“异域之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却也未尝不是观察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有益补充。蔡元培（1868-1940）的身份，卫礼贤认识的很到位，而对其文化资本的分析尤其全面，这也可从日后国人对蔡氏的盖棺

<sup>4</sup> Richard, Wilhelm: *Die Alten von Tsingtau* (青岛的遗老). Berlin, 1973. 转引自蒋锐《卫礼贤的汉学生涯》，载《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55页。

<sup>5</sup> 蒋锐《卫礼贤的汉学生涯》，载《德国研究》2004年第1期第56页。

<sup>6</sup> Ballin, Ursula: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卫礼贤简传). in Hirsh, Klaus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 - 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汉学家与传教士). Frankfurt am Main & London: IKO-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2003. S.19.

<sup>7</sup> [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第63-64页，王宇洁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定论中可以得到印证。冯友兰有这样的解释：“他（指蔡元培）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如程颐…说程颢‘纯粹如真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sup>8</sup>但将蔡氏描述为上代学者中留欧唯一人，则未免牵强。严复年长于蔡氏，且曾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即校长），其留英时间远早于蔡氏。不过，卫礼贤倒确实是以一个“外来和尚”的眼光敏锐地看出了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意义，即重建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制度，尤其是前者。如果说，作为教育总长的时代，相对关注作为整体的中国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那么，当1916年底蔡元培由法国归来并开始改革北大后，这项制度建设则更聚焦到一所具体的教育与学术机构，而且与作为外国人的卫礼贤的个体生命历程直接挂起钩来。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此前卫礼贤已与蔡元培长校的北大颇有来往，譬如他在1919年6月15日时即曾来北大讲演，据《德国尉礼贤到京演讲通告》称：

德国尉礼贤博士（Dr. Wilhelm）本彼邦哲学家，到中国已十一年，精通华文，尤研究中国哲学。已译成德文者，有论语、孟子、老子、列子、庄子及大学、中庸等，现正译周易，近适以事来北京，本校特请于十五日午后五时，在第三院大礼堂用华语讲演。演题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届时全校同人均可往听。<sup>9</sup>

可见，卫礼贤之受聘北大，不是一个突发其来的事件，而是事先即颇多铺垫<sup>10</sup>；如果再考虑到时任北大德国文学系主任的关键人物杨丙辰<sup>11</sup>，就是当初卫礼贤在青岛书院教学时的学生，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更有其水到渠成的一面了。但不管怎样，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作用不容低估<sup>12</sup>，卫礼贤得以比较轻松地进入到中国的大学场域，但我们应注意到这种报告多半与德国的文学、哲学有关系<sup>13</sup>。

但真正使得卫礼贤与蔡元培发生直接性关联的，还是1923年蔡氏重组德文系是对卫礼贤的延聘。其时卫礼贤正在失业，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德国外交部

<sup>8</sup> 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359-3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sup>9</sup> 《德国尉礼贤到京演讲通告》，1919年，北京大学档案，案卷号BD1919027。

<sup>10</sup>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1922-1923年卫礼贤任职德国驻华使馆期间，也有相当的机会与蔡元培接触。譬如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 Hans, 1867-1941）应邀访华讲学，时任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的卫礼贤，亲自由北京赶到上海迎接，并陪同其在上海、南京的讲学活动。参见《北大邀请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教授讲学的有关报道》，1922-1923年，北京大学档案，档案号BD1923002。在这类活动中，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发生接触关系，是很正常的。

<sup>11</sup> 杨丙辰（1892-1960年代中期，待考），早年获河南省官费赴德留学，1913年夏季学期起在柏林大学注册学习法律，原名为杨震文（Yang Zhenwen），在德注册名为Yang Dschen-wen。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杨一直在德留学，他归国后即任北大德文教授，之后并任清华大学教授。1933年，北平的中德学会建立后，他与卫德明分别出任中、德双方的干事。1935年时，他曾短期出任过开封的河南大学的校长。除了作为德文专业的开创者之外，他的重要功绩表现在翻译上。他翻译大量德国文学著作，诸如莱辛、歌德、席勒、豪普特曼等均有涉猎，是北大德文系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亦是德国语言文学学科第一代创始人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他还翻译过里尔的《德国民族的性格》与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Harnisch, Thomas: *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 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1999, S.173. Kreissler; Françoise: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Paris: Ed. De la Masi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9.p.289.

<sup>12</sup> 参见 Zimmer, Thomas: Richard Wilhelm, 1920-1930. in Walravens, Hartmut (zusammengestellt):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Missionar in China und Vermittler chinesischen Geistesgutes* (卫礼贤——在华传教士及中国精神产品的介绍者)。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8.

<sup>13</sup> 吴素乐《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载【德】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473页，李雪涛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大幅度削减人员，卫氏本就非外交官身份，故亦在被裁之列。蔡氏于是送了一纸聘为教授的一年期合同给他。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蔡元培之聘卫礼贤，既是出于为北大延揽人才的需要，同时也不妨看作“济友于水火之中”的雪中送炭。如此“公私兼顾”之事，原本多多益善。可惜的是，卫礼贤与北大的因缘，并不表现在聘用关系的长久上。1924年，卫礼贤本已准备与北大续签合同，但法兰克福的聘书正好到了<sup>14</sup>。于是他准备打点行装，毕竟，建设一个新的汉学学科的诱惑，对他这样的人来真地很难抗拒。蔡元培与卫礼贤的关系之所以颇为密切，可能与双方的文化背景之切合颇有关系。蔡元培致卫礼贤的书信都是用德文写的

但是卫、蔡之间的交谊并未因空间的距离而中断。卫礼贤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e），也同样寻求蔡元培的帮助，看重的当然是其中国学界领袖的地位。1925年11月12日，蔡元培致卫礼贤函，专门推荐学人参与卫氏创办汉学杂志的事业：“先生有意创立汉学杂志，我可推荐两位撰稿人，他们是傅斯年和俞大维。傅先生出生于山东一个名门世家，饱读经籍，博闻强识；自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先后在伦敦、柏林读书，业已六年。其专业为心理分析，但他也从事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俞先生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之家，其叔俞明震为著名诗人。俞先生聪敏过人，所欲学者，从不知其难；尤长于数理哲学，多有新论发表于德国杂志，并为德国数学界所注目。”<sup>15</sup>1925年11月14日，中国学院正式成立，并成为德国极为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机构。1924年11月21日，蔡元培赴德，入汉堡大学报名入学，研究民族学，时间大约一年余<sup>16</sup>，所以1925年他主要居留于汉堡。显然，卫礼贤对他的行程是比较清楚的，由此可见彼此的关系不会太远。卫礼贤甚至极力建议法兰克福大学授予蔡氏荣誉博士学位<sup>17</sup>，虽不果，然亦可见出卫氏的判断力。卫氏对此非常失望，便在自己的新著《中国心灵》（Die Seele Chinas, 1926）扉页上题词：“献给正义与自由之斗士、学者、友人蔡元培先生。”<sup>18</sup>其对蔡元培的推崇与敬重，可谓终身不改。而蔡元培同样对中国学院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但出任该院的董事会成员，而且“不遗余力地为学院筹集来自中国方面的官方和私人捐款，并取得了成效。”<sup>19</sup>可惜的是，天不假年，卫礼贤在五年之后即“驾鹤归西”。否则，这样一种学术交谊一定还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

作为一个客居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学者），卫礼贤与蔡元培的交谊相当可贵。一方面，这表明了卫礼贤的超卓眼光和活动能力。他对蔡元培之所以推重非常，乃在于充分认识到他对现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意义，即：“重新创造中

<sup>14</sup> Ballin, Ursula: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卫礼贤简传). in Hirsh, Klaus (hrsg.): *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 - 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汉学家与传教士). Frankfurt am Main & London: IKO-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2003. S.19-20.

<sup>15</sup> 致尉礼贤函（1925年11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4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蔡元培对卫礼贤创办的中国学院显然很有好感，1936年时还专门提及，他说德国人是愿意研究中国问题的，“二十三所大学中，有五所设中国学讲座，佛郎克府的中国学院，尤常与中国的学者生密切关系。”蔡元培《王光祈追悼会致词》（1936年3月10日），《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28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此处佛郎克府即法兰克福。

<sup>16</sup> 蔡元培1924年初迁往法国，为何11月抵德并赴汉堡大学求学呢？其原因是当年他在荷兰、瑞典出席民族学会大会时，遇见了莱比锡大学时的同学、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教授，但采尔盛赞汉堡民族博物馆资料丰富，劝蔡前往汉堡进行研究。蔡元培于是决定去其所在的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参见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第118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周天度：《蔡元培传》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sup>17</sup> 关于蔡、卫之间的来往，参见致尉礼贤函（1925年7月23日）、致尉礼贤函（1925年11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11卷第240、24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sup>18</sup> 张东书《卫礼贤的中国魂》，载《国际汉学》第6辑第4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

<sup>19</sup> 吴素乐《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载【德】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480页，李雪涛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国的教育和文化体制是他的主要目的。”（见前引文）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卫礼贤不但对蔡元培的经历相当了解，而且对其优长（兼具新旧之长，而易为各派所接受），及其抱负（对教育文化制度的重建）都有很深刻的认知。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相当难能。而在蔡元培，以其开国元勋、首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等现代中国文化与教育领袖的身份，之所以愿意折节下交，一方面显示了他的领袖气度的宏容大度，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可贵的学人品格。总体来说，双方共享的双重文化背景（两人对中、德文化都颇熟悉）恐怕亦为重要因素，毕竟知识精英的交流以学问、志趣和见地为基础。这一点，在蔡元培与伯希和的交往过程也有所表现。

早在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即于3月2日在巴黎拜访伯希和<sup>20</sup>。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还聘请伯希和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sup>21</sup>；而伯希和同样对北大在国际学术场域的在场与发声颇多贡献，譬如曾代表北大国学门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万国地理学会大会、促成中法交换图书、推荐中国学者李济荣获法国科学院考古与文学研究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l'Institut de France）颁发的儒莲奖金（Prix Stanislas Julien）等<sup>22</sup>。1933年1月10日晚，中研院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公宴伯希和，并由所长傅斯年致欢迎辞，而伯希和在答词中则表示了对中研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之意<sup>23</sup>。不过，也有一则小插曲，相传1935年伯希和与蔡元培一同鉴定中国文物，议论风发，而蔡氏则唯唯不置可否<sup>24</sup>。这固然可以视作外国学者和本土士人的差异所在，但毕竟伯希和在学问上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为中国教育界领袖的蔡元培而是沈曾植、王国维与“二陈”等学问大家。

## 二、伯希和的中国交游：以陈寅恪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介入者，汉学家的重要性值得予以充分关注。这不仅是说，汉学家因其特殊的所在国学术与文化背景，必然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外来之眼”的崭新视角；而且也意味着，真正学问博大精深的纯粹学者，有可能做出“别出手眼”的业绩，譬如说伯希和。当初伯氏初过而立之年而来到帝都北京，作为前辈学者的罗振玉就深震于其博学通识与才华流溢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sup>25</sup>。相比较卫礼贤更多以翻

<sup>20</sup> 蔡元培《西游日记》（1921年3月2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sup>21</sup> 参见蔡元培《敦请今西龙伯希和为北大考古学通信员的便条》（1923年1月9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sup>22</sup> 参见伯希和《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载《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伯希和致蔡元培函》（林语堂译）、蔡元培《复伯希和函》（1932年3月），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79-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sup>23</sup>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sup>24</sup> 林语堂这样回忆道：“伦敦举行伯灵顿中国名画展览，派两三位代表来南京上海监选故宫博物院名画。蔡先生当然与其事。外国代表中一位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你说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们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回观览之时，伯希和滔滔不绝表示其内行。这张宋画，看绢色不错，那张宋徽宗的鹅，无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却一声不响，不表示意见，只有口口客气说‘是的，是的’。后来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说，若有所觉，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丑没有。这是中国人涵养反映外人卖弄的一幅绝妙图画。”林语堂《记蔡子民先生》，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第27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sup>25</sup> 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第87页，1909年。此文分两部分载于《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1909年。桑兵教授称此出处为《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38页注释5，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当误。

译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学界<sup>26</sup>，那么伯希和完全是以一个纯粹学者获得权威辈的赏识和推重的<sup>27</sup>。这里相对忽视早年深受伯希和推重的两位中国学者——王国维与陈垣，将关注重心落在“后起之秀”的陈寅恪身上，试图从中略窥伯希和的学术品味及其与现代学术之互动可能。因为，毕竟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学术建设期的最杰出代表。

伯希和长陈寅恪十二岁，大致可算是师辈人物。但与陈寅恪的“大器晚成”不同，伯希和属于“少年成名”的那种人物。早在1901年时，年仅23岁的伯希和就受聘为法国远东学校（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简称EFEO）教授，可谓“大器早成”，让人羡慕不已。这与当时世界学术的整体背景又相关联，自1890年代后，世界考古重心东移，随着新疆、敦煌等地不断有新材料之发现，对学术发展有重要促进意义，而伯希和正是由于得此风气之先，能得利用新材料而开一时之风气。陈寅恪当初应聘清华时，《清华周刊》曾报导称其“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Sylvain Levi)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sup>28</sup>。从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显然是新闻报道的惯用伎俩，陈寅恪与伯希和的交情没有那么深。这种传说到后来则更加离谱，说是“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sup>29</sup>，无论是从年齿代际，还是实际时间，都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这明显是一种“请上神坛”的伎俩。

陈寅恪早期治学取向以所谓“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为选择<sup>30</sup>，对西方的“东方学”自然很重视，最为接近的当然还是汉学。他在留欧时代就自然会拜访法国的汉学家。这一点在其日后的诗作叙述中也得以印证，其怀王国维诗云：“伯沙博士同扬摧，海日尚书互倡酬。”其弟子蒋天枢记录陈氏自述解释道：“法国汉学者曾劝罗王两先生往游巴黎，然终不果。余之得识伯希和于巴黎，由先生作书介绍也。”<sup>31</sup>这里的“伯沙博士”即指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陈寅恪自己亦承认，他之早期治学曾“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第一人就是“法国P.Pelliot（伯希和）”<sup>32</sup>。不过这种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乃是常事，相比较王、陈二位对伯希和的推重；伯希和对中国学者也推崇王、陈二氏，只不过对前者之“王”乃王国维殆无疑义，在伯希和心目里，中国近代的世界学者就是王国维

<sup>26</sup>胡适在日记中对卫礼贤做如此评价，称其“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胡适：《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sup>27</sup>沈曾植被誉为“一代大儒，其学问深湛在彼时罕有人懂，而伯希和与他论学则“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牟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揜言”。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丙辰六月二十六日（1916年7月21日）。转引自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sup>28</sup>《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载《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

<sup>29</sup>《为国家作育人才文学院添聘教授多位——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载《岭南大学校报》1949年第91期。

<sup>30</sup>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载《中国文化》第2页，1997年12月第15-16期，北京。

<sup>31</sup>《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陈寅恪诗集·附唐笈诗存》第14页，陈美延、陈流求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sup>32</sup>这段话原来叙述是这样的：“寅恪先生又常说，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第1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对陈氏这段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经历，余英时的分析很有道理：“陈寅恪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最初或出于爱国动机，或为显学所掀动，或两俱有之，今已无从确知。但无论如何，在深入这一学术领域的堂奥之后，他自然比谁都清楚，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而言，欧洲的东方学是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他本人的基础功力在中国虽然首屈一指，但若与第一流的欧洲东方学家相较，也并不特别超出。”再进一步追问，就不仅是某个学者用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本国学统的建立与传承积累问题了：“而且东方学在欧洲早已形成有规模的传统，后起者除了在某些‘点’上寻求新的突破外，很难取得典范式的新成就。”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载《中国文化》1997年12月第15-16期第4-5页。参照这一立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寅恪归国之后中国学界多半对其推崇备至（陈寅恪所擅长之各种语言文字，中国学者难能也）；而伯希和这样的汉学家反而更推崇陈垣这样的史学家了（陈寅恪的西方学术训练，对汉学家来说没什么好惊讶的），但陈垣使用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而达致的精深境界，自然会使得外国学者敬佩。可当陈寅恪逐渐能将中、西学术融会贯通，在1930年代开始厚积薄发之后，情况就变了。

与陈垣两人而已<sup>33</sup>。

陈寅恪在留法时代之拜望伯希和，乃是经由王国维之介绍，而且在他的家中看到了韩本《元朝秘史》<sup>34</sup>；两者显然保持了交谊，日后陈垣欲联系伯希和，也是向陈寅恪索取通讯地址<sup>35</sup>。就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内部评价而言，“史学二陈”各有所长，未必一定要“扬一陈抑一陈”；而陈寅恪，其实大有后来居上之意但在193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陈氏踵步西人之东方学，就治学方略而言虽可使国人眼界大开，但对西人而言，实无甚高明新颖可言；但到了1930年代后期的时候，伯希和显然已意识到陈寅恪的重要性，在陈氏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过程中他对陈氏的评价曾被引用：“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sup>36</sup>即便考虑在书写推荐信过程中的“场域因素”<sup>37</sup>，如果不是对陈寅恪学术水准的认知有较大变更，以法国学者的严谨态度，很难有如此巨大的评论落差。毕竟，白纸黑字，以伯希和这样在世界学术场域中享有盛名的人物，是必须为自己的学术评价负责的。

从1933年之推崇陈垣<sup>38</sup>，到1938年之褒扬陈寅恪。五年之间，伯希和对中国学术祭酒人物的判断，已斩截有变？究竟是伯氏“老眼昏花”或“情面难违”还是学术发展确实“日新月异”，陈寅恪果然具备了让异域大师“刮目相看”的实力？但以在学术场域中阅历丰富者如伯希和，肯定不会不知道其中陷阱，胡适的推荐信中不过说：“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sup>39</sup>

事实上，看一看牛津大学所看重的陈寅恪之学术贡献，我们就知道国际学界评价\*的标尺所在。在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水平介绍中，特别强调的是其“贡献之重点”：

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

<sup>33</sup> 尹氏接着说道：“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元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意者夫子之道，其西行乎？儒在下风，欣忭何极。此间第一师范学校之长田恩需者，亦法国之留学生也，雅闻公名，又与张伯霖博士同学。而蒞生适毕业归来，公宴之间，亦颇道及。”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致陈垣函，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sup>34</sup> 陈寅恪致陈垣函十五，载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sup>35</sup> 陈寅恪致陈垣函七，列出伯希和的地址：“Prof. Paul Pelliot, 38 Rue de Varenne, Paris VII, France.”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同信参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sup>36</sup> 原文是：The great sinologist P. Pelliot considers Mr. Tchen as the best Chinese scholar who pursues his study with a critical method and is able to utilize all sources of material writte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1938年10月4日杭立武致A.G.Morkill函之附件“关于陈寅恪学术水平介绍”。Archive of Oxford University, CP/1, File 1. 此档案复制件承程美宝教授见赐，特致谢意。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5页。A.G.Morkill为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秘书。英文有拼写错误，径改之。不过伯希和此评判乃转引之语，需追索出处，以考究伯氏对陈寅恪的真实认知。

<sup>37</sup> 胡适说：“Cambridge大学中国教授Moule退休，寅恪电告Cambridge愿为候选，他们将暂缓决定，以待商榷。Pelliot允为助力。我已写一推荐信，昨交去。大概不成问题。”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傅斯年函，载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第75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颂平编著：《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5）第16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sup>38</sup> 关于陈垣与伯希和的交往，参见1933年1月23日陈垣致伯希和函（原稿），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17-4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此函详细讨论伯希和捐赠的俄京所藏《元秘史》来历。不过，陈垣对伯希和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对其载运敦煌遗书的行为是强烈而公开批判的。有论者这样解释其《敦煌劫余录》的题旨时这样说道：“取其历劫仅存之意，在《序》里有‘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当时有的朋友曾劝他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他们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他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的愤慨之思，怎能更改！’这反映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片丹忱。”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53-1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sup>39</sup> 胡适的推荐信，转引自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5页。

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sup>40</sup>

这段评价，其实最好地印证了陈寅恪自己的学术预期，即“预流”。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41</sup>正是以一种通识眼光与东西贯通的学养为支撑，陈寅恪能在1930年代以后更新学术思想，而皎然有“王者之相”。须知，此时其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都要到1940年代才能问世，而伯希和已然以一种近乎决绝的态度表达对陈寅恪的重新认知，不但殊为难能，而且也正显示出西方学者可贵的“求真品质”。这种态度，多少让人有些“前踞后恭”的感觉，但事实上则是“见真求是”。陈寅恪初出茅庐之际，其所发挥的乃是西人东方学之长，在国人眼中当然可拔得头筹，但在为数非少的西方学者那里则很难“技压群雄”<sup>42</sup>。这也是日后陈氏为何翻然变计，重寻学术生长点的根本原因。这一文本中所强调的三个重点，所谓“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蒙、藏、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是陈寅恪在留学时代花大气力掌握的治学工具，即承受西人“东方学”传统而得识的“殊族之文”。其根本则在第一条：“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更准确与概括地说：“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sup>43</sup>也就是说，陈氏治学的安身立命处，在将其治学手段落实到了学术对象的“恰当契合”处。从归国初期的西学痕迹浓重的考证文章，到将主要学术范围设定在隋唐之际。这正是陈寅恪学术路径调整的重要思路：“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sup>44</sup>这实际上是一个学术战略与策略的问题，正如同伯希和治学的求精不求泛、治史不治诗（文学）一样，乃是深悉其中可能陷阱的见道之思。伯希和逝世之后，其弟子叶理绥总结其学术特点乃在“不大注意于中国书上的一般大问题的讨论与表现，而宁愿对特殊个别问题加以深到的钻研”<sup>45</sup>。李璜认为：“这是

<sup>40</sup> 1938年10月4日杭立武致A.G.Morkill函之附件“关于陈寅恪学术水平介绍”。牛津大学档案，CP/1, File 1, 转引自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4页。由修中诚（Hughes, Ernest Richard, 1883-1956）经陈寅恪授权而提交的“高级中国研究计划·东方研究院”中就提及：“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上揭书第163页。这里的陈教授即指陈寅恪。

<sup>41</sup>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sup>42</sup>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sup>43</sup> 1938年10月4日杭立武致A.G.Morkill函之附件“关于陈寅恪学术水平介绍”。牛津大学档案，CP/1, File 1, 转引自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4-155页。

<sup>44</sup> 《朱延丰突厥通考序》（1943年），载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6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sup>45</sup> 叶理绥《保罗·伯希和（一八七六-一九四五）生平概略》，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第54页，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是俄国人，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语言，后至法随伯希和学习，通俄、日、法、英、德、汉等多种语言。后经伯氏推荐，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过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任主任等。在他的倡导下，哈佛-燕京学社将研究范围拓展到日本，并在哈佛创建远东语言系。

伯希和最聪明之处者，乃他能认识西方治中国学问者，对于中国的古典思想往往难于捉摸得定，而要能在中国文哲思想上加以贯通，发为议论，只在中国书本上求之已非易事，更何况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文学思想的境界甚难同样体验及之。”<sup>46</sup>这一评价，是相当切中肯綮的。作为第一流的大学者，伯希和与陈寅恪都充分意识到，治学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性，或谓“以小见大”（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或谓“扬长避短”、或谓“知其所止”，在他们身上都有非常自觉的表现；而被二者引为同调的陈垣之学术主张亦相近，所谓当“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sup>47</sup>。这也显现出，在陈垣的心目中，国际学术界的评价也是重要的考量之一，也难怪大家都能渐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应该说，伯希和与陈寅恪的交谊，乃是学者之间“棋逢对手”的最佳案例之一。作为20世纪最声名拙著的汉学家，伯希和的学术史地位毋庸置疑，傅斯年强调“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sup>48</sup>而陈寅恪则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第一代学者代表人物。虽然，早期伯希和尚未充分意识到陈氏的重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陈氏学问规模的显露端倪，他越来越重视陈寅恪。应该说，二者的交谊，代表着学院派学者交流的典范，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英雄肝胆相照”，这从陈寅恪对伯希和的态度可以见出、从伯希和对陈寅恪任职英伦事的鼎力相助也可以看出。而由于年齿和时空交错的原因，陈寅恪与卫礼贤当无机缘相识，更谈不上相知<sup>49</sup>。

### 三、学人交谊的双向功用：现代欧陆思想兴起的汉学背景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汉学因素

我们讨论伯希和、卫礼贤与中国学者的交谊，虽然不过两个个案考察而已，但似已可看出一种链性的网状关联。这样一种出自学者个体之交谊的跨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此，那就浅显了。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相当复杂的“异文化博弈”功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是卫礼贤、伯希和均有相当长时期的中国居留经历，而且他们的文化养成相当丰厚与复杂，即便就欧洲背景而言，至少各自代表了北方日耳曼-南方拉丁文化的差异；而其所代表的德、法学术传统，则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学术的两大重镇，德国固然以柏林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标示着世界现代学术的中心场域的确立<sup>50</sup>；而从13世纪以其国际性而成为大学渊源地之一的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到大革命时代拿破仑确立的精英大学校传统<sup>51</sup>，也同样标示着其在从“人文主义”转向“科学主义”过程中法国学术的重要性。而与他们交往的另一方，除了胡适之主要由美国文化养成的“一元留学人”（但他对德、法语还是略通的），如蔡元培、陈寅恪都是

<sup>46</sup> 《关于保罗·伯希和》，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第48-49页，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

<sup>47</sup> 陈垣接着说道：“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作也。”1933年6月24日陈垣致蔡尚思函，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sup>48</sup>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1935年），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册第46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sup>49</sup> 但值得指出的是，季羨林在整理陈寅恪笔记本时，曾指出在其一页关于甲骨片数的记录上提及“尉礼贤有600片”，当指卫礼贤。如此看来，则至少陈寅恪是了解卫礼贤其人的。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第\*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sup>50</sup> “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第3页，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sup>51</sup> 参见李兴业编著：《巴黎大学》第2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具有相当丰厚异文化资源的“多维留学人”。这样一种思想的碰撞和生成就必然是相当复杂交错的状态，而非简单的交流可以一言蔽之。

当时的中国学者，如方志澍就充分意识到国际汉学的范式区分，他将其一分为二，称为“考证派”与“翻译派”：

他们（指考证派，笔者注）觉到希腊拉丁考证学（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已经达到最高点，再不允许一鸣惊人的簇新研究（Originalforschung）。失掉了用武之地以后，他们不可不寻找另一荒地，就是我们的国学。……这派对于西域问题及塞外民族的历史，庞搜冥索有伟大的成绩。然而，其末流免不了皮毛之讥，甚至于有抄袭书目为职者。这派的特征，就是自信力太大，所以酷爱抬死杠。……他们（指翻译派，笔者注）的汉学，都有实质的根底。而且，他们的贡献，比考证派，实为宏大。因为考证派几乎成了考证工匠，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漠然不知，甚至于阅读汉文的能力，往往薄弱的可怜。然而翻译派也有缺点，就是武断。如理雅各，对中国文化有顽固无比的偏见。<sup>52</sup>

应该说，这段论述对欧洲国家的学术史有一定的整体把握，但论述未免略显偏执。对翻译派的肯定固然不错，但将考证派如此贬低却有问题的，如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其学术史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相比较之下，傅斯年同样也曾区分汉学家乃至亲华派西方主流思想家的类别与意义，则更值得重视：“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sup>53</sup>此文自有其特殊背景，而罗素则更应纳入到西方主流思想家、学者的范畴中去，如杜威、杜里舒等都是，而此处所关注的，是卫礼贤、伯希和所代表的不同路径。这其中固然有传教士汉学与学院汉学的差别，但德、法学术的背景似也不可不重视。德国学术虽然是世界中心，但诚如伯希和所批评的那样，德国汉学真地是殊不如人。

具体到两个个案而言，作为传教士的卫礼贤与作为外交官的伯希和，虽然日后都退入学院，以学者面目作为终身志业，但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机构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和传授知识的功能，它还是重新调整和配置个体（乃至家庭、阶层）的文化资本的过程，它能够对文化资本分部的再生产起到关键性乃至决定性作用，从而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再生产施加重大影响。故此，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具有核心意义的精英型的教育机构“就成了人们为了垄断霸权位置而进行的争夺的关键”（un enjeu central des lutes pour le monopole des positions dominantes）<sup>54</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了卫礼贤与伯希和二人日后迥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路径。相比较伯希和很早就进入学术场域，并以其学术成就而博得大名和场域地位；那么卫礼贤的教育之路，却是由教会教育所决定的，故此他虽然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成就卓著，但迈向学术之路却走的相当艰难。但有趣则在于，对双边文化交流史来说，卫、伯二人均具

<sup>52</sup> 方志澍《卫礼贤教授及其著作》，载《研究与进步》第1卷第4期第21-22页。

<sup>53</sup>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1935年），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5册第46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sup>54</sup> Bourdieu, Pierre: *La noblesse d'état – grandes é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国家精英——大学校与群体精神).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9. p.13. 中译文见【法】P. 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第9页，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有近乎“垄断性”的重要意义。不过，相比较卫礼贤对日耳曼文化思想的意义；伯希和的贡献，似乎主要在法国学术史本身。

就以上研究的学人交谊而言，似乎应关注其“双向功用”，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汉学因素，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追问现代欧陆思想兴起的汉学背景。这样，就需要我们将关注的视野扩大，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汉学家的中国交谊，必须要求其扩大知识域，而非仅仅是“术业有专攻”而已。除了伯希和这样少量的顶尖级学者可以与中国一流学者从容“就中学论中学”，其他一般学者恐怕很难做到。故此，他们就必然要有“入乡随俗”的一面，也就是说要念“外来和尚之经”。有论者指出，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而言，“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不同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大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史子集诸方面。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竟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sup>55</sup>卫礼贤在中国的交谊其实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在他与辜鸿铭、蔡元培等人的交往中，歌德、荷尔德林等德国话题当是很重要的；而在北大等地演讲时，他也往往是要扯上德国的先哲如康德、歌德等作陪衬。

二、以机构和机制的形式将这样一种学术交流固定和长期化。应该指出，德、法学术界对与中国学术交流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民国时代的若干机构的创设上。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中法汉学研究所（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在北平的创建，就是最好的例子。相比较美国人的同类行为，如哈佛所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中印研究所等，那么德、法汉学界在北平建立的这两个机构几乎就成了一种相当典型的示范性机构。虽然日后因为战争的爆发而受到很大影响，但也仍坚持了相当时间。而这两个机构与卫礼贤、伯希和都是有关系的，前者的发起人一为卫礼贤的亲密朋友兼弟子的郑寿麟、一为其子卫德明（Wilhelm, Helmut）；后者则在留德时代与卫礼贤过从颇密，并深受卫礼贤促进中德文化交流的理想与努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卫礼贤、伯希和作为德、法汉学的重要人物，其影响力是相当深远的。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交流并非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譬如卫礼贤与其他法国学者也有交谊。譬如在北京时，就曾与铎尔孟（André Roquette Dit d'Hormon, 1881-1965）等一起参加过东方学会（由柯劭忒、罗振玉等组织）<sup>56</sup>；卫礼贤似乎还试图将其建成一个有多种资金渠道来源的有效性机构，譬如他希望同善会能对此计划感兴趣，并区别于此前的“李希霍芬研究所”的德国民族色彩<sup>57</sup>。

三、德、法汉学在20世纪前期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与两国各有其特殊性的学术背景和传统很有关系。而法国学术发展到18、19世纪之交，其实正是大可注意之时。其中有两个学科的兴起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特别予以关注，一为汉学，一

<sup>55</sup> 《清水一片光照人——追忆傅吾康教授》，载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第22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sup>56</sup> 其他外国学者还包括如钢和泰、福开森（Ferguson, John C.）等，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4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原文注释称引金梁《瓜圃述异》，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第34页，未能核对到。此书当为金梁：《瓜圃丛刊叙录》，台北：文海出版社作为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辑》印行。

<sup>57</sup> 吴素乐《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载【德】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472页，李雪涛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 Wilhelm, Richard: "Peking Orient-Institut". In *Ostasien-Jahrbuch*(1921), S.29-35.

为比较文学。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汉学讲座，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在西方大学体制内首次占据一席之地，首任汉学教授是雷慕沙（Rémusat, Abel, 1788-1832）<sup>58</sup>；1817年，诺埃尔（Noël, F.）提及“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这个概念，1827年，维尔曼（Villemain）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sup>59</sup>。所以，我们或许可以注意到，学科的发展与周边的学术群是有关联的<sup>60</sup>。法国汉学之强大，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悠久传统，德国汉学要晚至1909年（汉堡）才建立，不但远逊于作为发凡起例者的法国，而且要逊于俄（1851）、英（1876）等国，而自雷慕沙、儒莲而沙畹，似乎可以认为构建出了一套比较纯粹的学术传统；其次，法国汉学家相对而言有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在与本国学术主流互动和资鉴经验方面，这点德国汉学界似乎颇有不如；三者法、德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毕竟地位不同，相比较前者的老大地位与殖民需求，德国是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其“特殊道路”也决定了它对东方学的需求没有前者那么迫切和强烈，这或许也是政治、文化背景因素限制学术发展的一例？不过有趣的是，德国汉学作为一个特殊学科建立后，与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纠缠似乎很明显；相比较法国汉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学术性探求的基础之上，德国汉学的殖民利益考量似乎更强<sup>61</sup>。对这个问题，中国现代留欧学人已有所意识，相比较冯至后来组织留德精英来翻译出版《五十年来德国之学术》，李璜则以一人之力陆续翻译了《法国学术史》的部分内容（《法国汉学史》、《法国社会学史》等）。

当然，这样一种中欧学术的密切交往，与中国学者的留西背景不可分割。因为虽然汉学家均通汉语，且往往能流利对话<sup>62</sup>，但双语（乃至多语）交流毕竟更加便利，再加上他们在西方大学与学术体制中接受过训练，与对西方学术本身很熟悉，则使得大家更具共同语言。但这样一种深度认知，也正造成了中国现代学者对德、法学术（汉学）的取径有别，有论者甚至认为：“德国学者的论著虽然也屡被陈寅恪先生引用。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受德国传统的影响应该是最深的。但是，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学术问题的选择，陈寅恪先生身上的法国东方学色彩远比德国东方学色彩浓厚。”<sup>63</sup>此诚的论，德、法汉学的层次水平还是有异的，正如伯希和在德国批评德国汉学殊不如人那样<sup>64</sup>。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德国汉学并非所长，陈寅恪为何又要两度赴德，立雪程门呢？这一点其实不难剖白，陈寅恪是对德国情有独钟，可他要攻读的不是汉学，而是梵学（导师是梵学家吕德斯）。他欣赏的是作为整体的德国学术，而非作为德国学术边缘的汉学相比之下，陈寅恪对德、法汉学家的领军人物态度也相当不同。一方面，他对德国汉学家如福兰阁相当不看好，不同意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的特约通讯员，称

<sup>58</sup> 戴密微（Demiéville, Paul）《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戴仁（Drège, Jean-Pierre）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Cinquante ans d'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第24页，耿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sup>59</sup> 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情况，可参见【法】马·法·基亚（Guyard, M.-F.）：《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法】伊夫·谢弗勒（Chevrel, Yves）：《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王炳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sup>60</sup> 参见【英】托尼·比彻（Becher, Tony）、保罗·特罗勒尔（Trowler, Paul R.）：《学术部落及其领地》（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sup>61</sup> 譬如被尊为德国汉学代表人物的福兰阁，在其子傅吾康的眼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交官，政治是他人生之中至关重要的东西。”Franke, Wolfgang: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神系中国——一个汉学家的自传1912-1950）。Dortmund: Project Verlag, 1997. S.116.

<sup>62</sup> 但也不尽然，如马伯乐虽“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不过是“强作汉音，殊有风趣”而已。高名凯《马伯乐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sup>63</sup> 钱文忠、王海燕《陈寅恪与季羨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载《文史哲》2002年第1期第35页。

<sup>64</sup> 1926年10月26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集（1923-1927）第4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若约聘此人会使外人怀疑到我们的学术判断水平，不知背后是否也有其它的场域考量因素在内？可他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却态度相当不一样，虽然陈寅恪“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极不耐烦应酬，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作东”<sup>65</sup>，可见相当敬重。这也可从另一方面可证明法、德汉学在陈寅恪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他对当时世界学术的整体进展状况是心中有数<sup>66</sup>。

但如果只看到了这一点，也还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事实上，对于现代欧洲而言，因一战而爆发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孽根性，导致了人心的极大困惑。德国固然不仅经济衰退，而且整个国家与民族在一种相当迷惘的精神危机状态法国的状态也很不妙。胡适曾有这么一段话：

这一次大战，真是欧洲文明的自杀，法国已不可救了；拉丁民族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将来在世界上只有下山的前途，没有上山希望。德国精神还好；将来欧洲必有俄德英联成一片的时候，欧洲将永为日耳曼斯拉夫民族的世界。但世界的文化已在亚美两洲寻得了新逃难地正如中国北方陷入野蛮人手里时，尚有南方为逃难地。将来欧洲再堕落时，文化还有美亚澳三洲可以躲避，我们也不必十分悲观。<sup>67</sup>

这样一种判断当然可备一说。但欧洲文明的前途，看起来确乎是大问题。难怪当初力主西化的梁启超在欧游之后，信心倍增，大谈“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甚至要求青年人自称一种新文化系统并对外扩充，然后有这么一段豪言壮语：“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sup>68</sup>过于极端当然是个问题，但事实倒也是，对于现代欧洲来说，中国及其文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存在而已，它曾相当实在与深刻地影响到欧洲文化与思想世界的历程。而这其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是卫礼贤。凭借其德译中国经典和对中国文化的普及工作，而对德国与西方语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荣格在其逝世之际，不惜以崇高的语言来表彰其人：“卫礼贤无愧为一个大师，他不仅超越了他的职业范畴，而且以他的学识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他自始至终一直如此。”<sup>69</sup>这并非一般意义的死后哀荣的颂词而已，因为在荣格，有着与卫礼贤长期学术与思想交往的友谊，乃是对其精神人格有深度认知和感受后的肺腑之言。如果说这仍不免带有挚友追忆的褒扬色彩，那么后世论者的评价可谓立场客观，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对中国的兴趣达到了高潮的原因与卫礼贤联系起来，认为他的翻译、写作、讲座、建设中国学院，不但是为了一种学术性汉学的建立，更是为了一种大众化汉学的普及<sup>70</sup>。应该承认，就对欧洲（或西方）思想本身的形成而言，影响之大、涉及之广，未有过于卫礼贤者。

<sup>65</sup>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sup>66</sup> 就汉学领域而言，法国（巴黎）确实为其时的世界学术中心，所谓“英美德荷比瑞士及北欧各国研究汉学的专家，接踵而来巴黎，求教于法国汉学家。当时汉学家上课，各国远道来听讲学生甚众。”陈定民《中法文化交换之回顾与前瞻》，载《中法文化》第1卷第1期，1945年8月。

<sup>67</sup> 1922年7月3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集（1919-1922）第71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sup>68</sup>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选），载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第428-42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sup>69</sup> 荣格《纪念卫礼贤》，载【德】卫礼贤、【瑞士】荣格：《金花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第141页，通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

<sup>70</sup> 参见 Walravens, Hartmut: *Sinica und andere periodische Publikationen des Frankfurter China Institut – 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 1925-1942* (《〈中国〉与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当时其它出版物》). Muenchen, 1981.

可即便是被视为纯粹学院人物的伯希和，其活动范围也并不仅限于学界而已。1935年5-6月，伯希和夫妇来华作最后一次访问，期间在上海出席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送仪式，并代表法方致词。当时法方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伯希和亲自挑选1500余种法文书籍捐赠，出席者甚众，包括名流如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sup>71</sup>。而李石曾更对伯希和颇有表彰：“中国与欧西的文化沟通，法国有同样的伟大贡献，伯希和先生是一位很专门的汉学家，他代表法国协会同时又代表威尔顿公使来参加，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没有讲，兄弟稍为补充一下，就是在巴黎的中国学院，是班乐卫创办，并有伯希和先生的帮助，才组织成功。不幸班先生去世；好在还有伯希和先生与其他的好多位继续班先生努力，要求发展……”<sup>72</sup>

总体来说，卫、伯二氏的中国居留值得深入考察。他们两人均有过长期驻华经历，并通过其孜孜不倦的学术（或高深，或普及）工作与文化活动，成就了自己作为一代学人的事功与思想。此处初步探讨二君与中国现代若干代表学者的交谊，他们的巨大贡献与思想史意义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其身后的巨大思想宝藏和学术史意义如何进一步揭示，仍有待学界同仁的戮力推进。但我坚信的是，卫礼贤和伯希和不仅在中欧之间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们同样具备世界范围内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意义！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与他们有深厚交谊的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的那批学者，身上也蕴藏着丝毫不逊色的思想矿藏。

<sup>71</sup> 参见《法公益慈善会赠书东方图书馆昨举行隆重赠受典礼》，载《时事新报》1935年6月7日，上海。

<sup>72</sup> 《在法租界公益慈善会赠书仪式上致词》（1935年6月6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第264页，台北，1980年。此处提及的班乐卫（Painlevé, Paul, 1863-1933），是法国学术场域的重要人物，他不但在学术上成就卓著，中年转入仕途，同样一帆风顺，让人羡慕。自1909年由巴黎五区选为众议员，到1917年出任内阁总理，他只用了区区八年时间，其间历任公共教育部长、国际技术发明部长、陆军部长等要职，可谓阅历丰富。1920年班乐卫率一个五人小组的法国知识界代表团访华，谱写一段中法文化因缘。关于班乐卫与中国的关系，参见《法国前总理班乐卫访华之行的意义》，载陈三井：《近代中法关系史论》第219-24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Bastid-Bruguière, Marianne: "Le voyage en Chine de Paul Painlevé en 1920" (班乐卫 1920 年的中国之旅), in Claudine Fontanon et Robert Frank eds.: *Paul Painlevé (1863-1933) - un savant en politique* (班乐卫——一位致力于政治的学者).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pp.83-103.